



《寄生上流》－ 被性別盲綁的階級困境

連家萱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昱名 /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性別隔離下的階級流動難題

2019 年，熱門韓國電影《寄生上流》，憑藉著其寫實的首爾底層家庭半地下室繭居拮据場景、演員們對於階級矛盾所產生的思想與行為上的人性扭曲，以及受限於社會結構身不由己的深切刻畫，加上巧妙融合了黑色幽默與懸疑驚悚的優秀劇本，成為該年度臺灣的熱門電影之一，並在 2020 年的奧斯卡獎上大放異彩。《寄生上流》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於亞洲競爭型社會下高房價、低薪、低福利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統治政策的討論，引發許多從產業經濟生態與社會資源分配政策視角出發的階級流動可能性的討論，許多影評也由此出發，探討「貧窮 vs. 富有」、「有產 vs. 無產」的階級互動文化與生活模式間的理解與溝通鴻溝，但這些鉅視結構的宏觀討論，基本上在當前無可撼動的資本主義與全球化資金流動所衍生競爭至上的世界體系運作架構下，除非國家政府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價值觀與正當性追求有重大的變革（例如將國家治理的目標從追求個人市場產值轉向對於公民權利與多元文化的保障），因此總留給觀影者不勝唏噓之感，對於影片中情節既感到痛心惋惜卻又似乎無可奈何。「難道就沒有甚麼改變的可能性嗎？」、「如果身處電影中的底層階級，難道就只能落入貧窮的惡性循環翻身無望，進而絕望犯罪寄生嗎？」相信是許多影評者和觀眾觀影後共同揮之不去的無奈念想，但筆者發現，若從性別意識覺醒與平權推動的角度來看，其實該片反而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父權體制下性別秩序的權力與資源誤置

儘管我們身處在講究適才適性、發揮競爭、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體制中，理論上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去取得生存的空間和資源；但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建構卻控制了人們的選擇與自由，使得人不論是在家或出外工作都無法各盡其才，故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壓迫秩序有改變的需要。但如此顯而易見清晰的觀點為何無法產生實際上的改變？錯誤總是一再的複製呢？那是因為「父權體制在本質論上，就把父權秩序建構、詮釋成根植於萬物的自然秩序，透過偏頗的觀點強化壓迫支配的正當性與性別隔離」（成令方等譯，2008），所以儘管我們可以從影片中看出階級觀點下貧富差距與貧窮文化所造成相對剝奪感的嚴重性，但卻無視其中的性別壓迫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生存策略錯誤，正是本文想要點出之處。

不適合領導卻被綁在父權領袖位置的父：金基澤

首先從最實際的家庭經濟問題來看，就看到性別刻板印象對職業選擇與家庭權力分配束縛的錯置影響，影片中貧困代表的金家（父：金基澤、母：忠淑、子：金基宇、女：金基婷），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從金父一連串的創業失敗虧損欠債，家境就一蹶不振，金父所做的投資，是近代韓國普遍認為是一窩蜂類型的短期投機（如臺灣古早味蛋糕連鎖加盟），接著又連兼職也都做不穩，連做家庭代工折比薩盒也都品質堪慮，既產生了自我社會角色認同危機，封閉自我沒有朋友，也產生經濟收入不穩定的問題，三餐不繼，只是喝啤酒吃吐司邊瞌睡度日，連帶產生與外界社會網絡接觸的恐懼，甚至連醉漢騷擾居家環境或清潔隊噴藥消毒，也都喪失自信去反應，離崩潰恐僅懸一線。若從金家四人的真實能力來看，最不適合擔任家庭決策與實際運作維繫的就是金父，但這個家庭的運作決策模式又偏偏呈現出最傳統的東亞儒家父權體制性別秩序的分工，理想上就應該是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male-identified）、男性中心的（man-centered）（成令方等譯，2008），所以無論金父如何退縮、自卑、短視、無能，他就是只能被僵固地網綁在一個應該全知全能並能協調平衡各方的領導性角色，但實際上他卻無能為力，甚至在各種極端的狀態底下都必須擔當家庭對外的代表，但卻又不見得能夠得體應對。被雇主夫婦抱怨經常有差點逾矩越線的言行，實施詐騙的對話過程都必須由他的子女幫忙構思腳本、陪同練習微調，甚至後來遭遇到暴雨成災、家園傾頹的時候，子女期盼父親能夠扮演好家庭領袖所以徵詢他意見的時候，雖然誇口計畫成竹在胸、大家不用擔心，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他除了自卑衝動外，根本只是徒有氣勢卻沒有解決的方法，甚至說出「沒有計畫，才是最好的計畫，因為就不會落空」的空話，最後闖下大禍殺人逃亡躲藏。從金父的故事脈絡與角色設定來看，他並不具備家庭領袖與運籌指揮的能力，不如當一個受指揮者，凡是劇中他接受妻子或子女指揮的事情，反而都較為順利，但傳統僵固的性別刻板印象，卻使得他不得不扮演這個他不稱職的角色，反倒暴露他更多的能力短絀與個性缺點。

撐不起家卻一定得扛起的長子：金基宇

另外一個傳統家父長家庭秩序中可能擔任家長位置的角色是長子基宇，他也是本片所有故事的起點，因為高中同學的關係，被推薦到富有家庭擔任英文家教，但整部片中卻看不到他的實力，只有虛張聲勢，大學落榜四次卻仍只將頂尖大學列為志願，從第一堂課所展現出來的教學內容也是自信心與解題的氣勢，而非技巧或知識，詐騙用的假證件也要委託妹妹製作。整個故事中，他不斷守著那顆象徵著財富與幸運的山水景石，卻不知何用，連起了惡膽想要滅口卻反而被撂倒，石頭還被奪走反而成為自己被攻擊的凶器，想得到的致富之道就只是跟有錢人家的女兒結婚；甚至是故事結尾立志向要買下豪宅讓父親光明正大走出地下世界，卻只能是一場夢，都反映他是一個

自信心與實力有極大的落差的人，但他是長子長兄，是父親口中的驕傲，所以他才能得到家庭資源去補習，而不是成績與能力看起來都較優秀的妹妹，即便能力不足，重振這個家甚至買下豪宅讓父親光明正大走出來這個夢，還是只能有長子來做，而非下文所提及的有能力得多的媽媽。

無姓、無酬下隱形的母職：忠淑

反觀影片中始終不見姓氏的金家母親忠淑，曾經獲得全國田徑比賽的鏈球優勝獎牌，是家中唯一在社會上取得過正式被承認輝煌紀錄的人，不僅個性上較為沉穩低調，在影片中的許多對白也都展現出她的社會經驗與智慧，例如遇事敢於據理力爭，或者說出「不是有錢而且善良，是有錢所以可以很善良，如果我有錢也可以很善良」這樣饒富社會批判意味的話，看穿了階級意識影響下的價值選擇，只是被社會結構所迫所做出的選擇，還有著令丈夫不敢對她家暴的戰鬥力和口才，會勸丈夫鼓勵子女，對家庭決策的建議也往往比較中肯理性，甚至擁有優秀的廚藝，能把過去從未聽聞的炸醬烏龍麵加韓牛，烹煮到讓雇主一家讚不絕口搶著吃。

忠淑顯然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市場中比較有能力獲取高薪資的人，但她卻始終只能自願在家中擔任輔佐性的角色，情願埋沒自己的本領而屈守在主婦的位置，找工作也是家務延伸出的管家。儘管在片中她其實比較適合「家長」這個領袖的角色功能，能在悲劇發生後帶著腦傷的兒子打官司謀生、處理女兒的喪事，重新把家庭運作拉回平衡狀態，但卻始終被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刻板印象束縛，不見己姓，跟富家太太一樣是片中那一群看不到姓氏的人，只能從夫家的從屬角色認同自己，從而無力扭轉這個悲劇。

因為是女兒，只能「欠栽培」：金基婷

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金家女兒基婷身上，她的電腦技術高超到連哥哥的朋友都廣有耳聞，偽造文件的精緻程度更令父親稱讚：「如果首爾大學有偽造文書系，基婷一定可以第一名錄取」。她也有畫畫的藝術天分，儘管在自家聚餐時謙稱只是把網路上查到的藝術治療與心理學的內容背下來，卻是電影中唯一真正有發揮功能的家教，讓不受拘束我行我素的難搞小孩變得謙恭有禮，畫作水準也大有進步；相較於父兄家道中落後完全退縮的窘狀，基婷也是金家成員中唯一抗拒殺蟲消毒氣上身、甚至還主動出外找兼職的人，多次稱職扮演他人詐騙婚禮情境中的演員，還能搶到捧花積極加薪，去富家面試前還會把背景資料，用韓國人從小到大持續被教育的愛國歌曲《獨島是我們的領土》旋律編成順口溜記憶。比起父兄虛張聲勢和臨時抱佛腳的應變風格，來得沉穩並有準備得多，但她卻因為家裡沒錢並把資源傾盡給哥哥而無法進一步補習深造，變成一個傳統東方社會中，因家境困苦把家庭階級流動資本傾讓給兄弟的「欠栽培」典型犧牲角色，使得她不習慣規劃未來，對於夢想不甚積極，即便已經寄生於豪宅，在奢華的空間中用著昂貴的用具吃、喝、泡澡，卻對哥哥閒聊作夢的話題不感興趣，畢竟，未來如何走，家中的資源要如何分配，是父親與哥哥在決定的，她只能聽命配合，儘管她有更好的能力和知識。

改變：性別充權從觀念與日常生活開始

所以總體來看、簡單來說，金家之所以寄生失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父權體制思維下的錯誤方針決定權力與資源分配所導致的悲劇。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因為性別刻板印象操演下的職業分化觀念，導致每個人都無法適才適性的在自己能發揮的角色上作用，儘管我們身處的自由主義社會強調的意識形態認為，「個人自由與市場競爭這一隻無形的手，將會促進所有參與者的利益」，但一旦「讓每個人都能自由發揮、追尋最大競爭力」這樣的重要前提，被性別刻板印象打破時，自由市場下的互利共生榮景就不存在可能性，只能是相互壓迫爭奪控制的不理性失靈市場，無可避免導致崩潰的結局。不知是否有讀者跟作者們一樣，我們常常提到的性別平權與反性別歧視的價值觀與做法，其實不過就是一般的常理與社會共識，例如平等、自由、人權、正義等，但不知為何，當輿論在討論社會問題的解決或是社會觀念的調整時，卻總是很輕易忽略性別視角的重要性。這是「性別盲」現象（賴美言，2007，頁 46），因為男性霸權已經由各種社會制度與論述的強化與灌輸，確保其得以不斷延續和再製衍生，使大眾自然認同性別歧視的種種基礎，成為「男造環境」，即以男性為主體的世界觀建構之社會，而漠視這其實是一連串文化與語言論述所形塑建構的，不管是從生理差異論或文化建構論的父權社會，其論述底蘊其實都充塞著決定論色彩，天生之生理性別已決定好一切的人生軌跡與角色價值，忽略了多元社會變遷的可能性和個人的能動性與自由。簡言之，無論是依據生理性別或是社會性別所建構出的性別角色分化與職業隔離論述，性別差異都被視為既定的、僵化的封閉系統，構成了性別盲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自我認同與職涯發展的集體性束縛。是故解決之道便在性別敏感度的「充權（empowerment）」，在個人層次上的生活實踐中，要認知到因性別所造成的權力不均與角色束縛，雖然在過去有一定的習慣，但隨著社會結構與家庭價值的改變，性別已經不能成為現在社會造成地位區隔與權力傾斜的正當性理由，更不是以知識經濟為主的就業型態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能力考量、專業考量才能是適才適性發揮作用的關鍵；在社會結構的鉅視面向上，例如教育內容、政府文宣或者媒體報導自律上，都應該要落實性別平權的內涵，不複製或增強性別刻板印象，並透過媒體力量導正性別迷思與性別職業分化，讓性別平權的概念與實踐成為日常社會化中規律正常的呈現。如此，自由、多元的人權平等社會方能成真，不再徒缺性別平權這塊很重要的價值與行動拼圖。

參考文獻 郭信愛、文陽泉、張英煥（監製）、奉俊昊（導演）(2019)。寄生上流【DVD 影片】。臺北市：威望國際。賴美言（2007）。“邊緣舞進中心”～從女性主義治療觀點跨越習以為常的性別盲。輔導季刊，43(3)，42-51。

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原作者：A. G. Johnson）。臺北市：群學。（原著出版年：1997）

（本文轉載自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93 期 127 頁-132 頁）